

## 营商环境、进入壁垒与企业定价能力\*

姚博 刘婕 魏玮 魏艺明

**摘要:**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营商环境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但鲜有文献探讨营商环境与企业定价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加成率模型,识别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并探讨其微观作用机制和进入壁垒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抑制了企业定价能力,机制检验表明,制度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重要的传导渠道。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抑制作用受进入壁垒的影响,如果企业面临的进入壁垒较弱,那么营商环境改善就能够起到显著降低企业定价能力和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创新水平高、规模大的企业来说,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较小。而对于融资约束紧、技术水平低、民营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来说,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效应会比较明显。本文研究对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市场化机制改革和提升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营商环境 进入壁垒 定价能力 市场竞争

###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等各项工作。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随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多项相关改革来破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堵点和痛点,并不断优化为市场主体服务的方式和方法。完善营商环境对于释放市场巨大潜力、提升市场规则公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可有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促进大量企业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并基于实证分析深入探讨营商环境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对于保障各类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资源要素,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将研究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定价能力产生的影响,并对其中作用机制和进入壁垒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进而为营商环境改善效果提供来自企业定价能力方面的经验证据。企业是支撑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改善营商环境主要解决的就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关系。从已有研究来看,营商环境为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带来积极影响(牛志伟等,2023;张菀泓、杨广钊,2022),但是企业在市场上的定价能力更能够反映企业在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之间权衡,以及消费者获得福利问题,具体表现为企业定价能力越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越小。现有研究较多关注营商环境

\*姚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06,电子邮箱:yaobo011@163.com;刘婕,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710129,电子邮箱:liujie01@nwpu.edu.cn;魏玮、魏艺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邮政编码:710061,电子邮箱:wei\_wei@mail.xjtu.edu.cn,wei\_yiming@126.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比较优势演变作用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及价值链提升研究”(16CJY035)。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对企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鲜有文献考虑营商环境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其他影响,例如,市场竞争加剧的问题。

企业定价能力通常可以用于衡量企业的市场势力。那么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产生怎样影响,如果有影响,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其中内部机制是什么?更进一步地,Autor et al.(2020)认为,市场机制改革会使部分企业受益,企业之间异质性比较明显。这种异质性来源如何?企业进入壁垒是否也存在于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当中?厘清这些问题,将为更好理解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定价能力提供微观解释。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一支文献是对营商环境的经济影响进行讨论,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两个方面。营商环境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文献有:Piwonski(2010)指出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Haidar(2012)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董志强等(2012)认为营商环境可以提升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便利程度,促进创业活动和刺激经济发展。Gillanders & Whelan(2014)认为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提升人均收入。Bah & Fang(2015)认为较差的营商环境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且会降低生产力产出。侯冰清和王兵(2022)研究了营商环境对不同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外生技术进步一营商环境效应联合驱动的结果,而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则是由外生技术进步一效率改善联合驱动。杨开峰等(2023)认为营商环境建设提升了公众对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形成了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能够产生经济领域以外的正向溢出效应。

关于营商环境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产生重要影响作用。例如,有一些研究表明,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Commander & Svejnar, 2011),加速企业注册(Demirguc-Kunt et al., 2006),降低信贷成本(周泽将等, 2020),拓宽企业融资渠道(Ključnikov et al., 2016),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杜运周等, 2022; 申烁等, 2021),促进企业成长(Ayyagari et al., 2008)。同时,有一些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降低制度成本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例如,夏后学等(2019)、刘锦等(2014)研究表明营商环境能够降低企业寻租活动和制度性成本支出。张菀洺和杨广钊(2022)认为营商环境通过打破寻租机制,降低企业市场进入成本,提升市场运营效率和企业活力。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研究指出营商环境能够缓解外部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此外,也有研究认为,营商环境对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积极作用。牛志伟等(2023)研究指出营商环境优化完善了公平竞争、法治、商业信用等环境,其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员工权益保护、员工信任度提升,最终影响企业生产率提高。不同于上述文献大多聚焦于营商环境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带来的积极影响,本文将从企业定价能力角度,分析营商环境带来的制度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竞争增加效应,并纳入进入壁垒因素,考察营商环境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成本加成率反映了企业市场垄断势力,是衡量企业定价能力一个有效指标,也是经济学领域非常重要研究问题。成本加成率越高,意味着企业的价格和成本偏离程度越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越有话语权,其在市场中定价能力越强。已有研究认为影响企业加成率和定价能力因素包括:人民币汇率变动(盛丹、刘竹青, 2017)、最低工资政策(赵瑞丽等, 2018)、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Chen et al., 2020; 柏培文、喻理, 2021),这些因素主要是提升了企业经营成本,进而导致企业成本加成率降低。此外,产业集聚(Zhao, 2011; Lu & Yu, 2015)、人口集聚(黄先海等, 2019)、进口(黄先海等, 2016)、出口(许明、李逸飞, 2018)、贸易自由化(Edmond et al, 2015)、城市规模(赵瑞丽等, 2019)、税收激励(盛丹等, 2021),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竞争和创新环境因素变化,从而导致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此外,本文研究还与基于企业加成率而展开的市场进入壁垒文献密切相关。现有文献表明,市场垄断壁垒下降、竞争程度上升会降低企业成本加成率,例如,钱学锋和范冬梅(2015)认为提高出口退税率将会提升出口企业之间竞争程度,进而降低企业成本加成率。Konings & Vandenbussche(2005)认为反倾销的贸易保护壁垒提升了欧盟域内的成本加成率水平。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关于营商环境和企业加成率各自研究有很多,但鲜有文献考察它

们二者之间关系。因此,本文将从营商环境视角出发,探讨其对企业加成率和定价能力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构建异质企业加成率模型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拓展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产生影响的机理,并考虑在不同制度成本、行业固定成本、产品替代弹性的市场进入壁垒情形下的分析。其次,使用1998—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检验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定价能力影响效果。之后,验证了制度成本降低效应与市场竞争效应的作用机制以及市场进入壁垒的调节作用,最后,还考察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文献上补充了关于营商环境对企业经济行为影响的探讨,既有文献主要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生产率、创新、融资、经营绩效等方面产生影响,但鲜有文献从定价能力角度考察营商环境对微观企业影响。本文在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及机制,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空白。(2)通过构建一个异质企业加成率模型分析框架,将制度成本、不同市场进入壁垒的情形纳入理论机制当中,从一般均衡角度全面探讨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3)在实证方面采用了更为多元化的识别策略,能够详细对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本文对制度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进行了较为严谨验证,同时考察了市场进入壁垒的调节作用和多个异质性检验,有助于提升现有文献对营商环境产生经济效果的理解。(4)不同于现有文献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构建的研究方法,本文从政务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几个维度对营商环境指标进行较为全面科学评价,丰富了对营商环境的测度方法。

## 二、理论模型

假定考察的企业是在垄断竞争市场进行生产经营,每个企业的定价能力均有不同,营商环境主要通过降低制度性成本促进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对定价能力产生抑制影响。具体地,营商环境改善使得企业面临的制度进入壁垒下降,降低了制度性成本和市场临界成本值水平,引致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从而降低在位企业的加成率和定价能力。营商环境抑制企业定价能力存在不同类型的异质性,当营商环境改善导致更多企业进入市场后,如果存在行业壁垒即进入成本较高,原有企业的先行势力较大,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小。如果产品壁垒即企业的产品替代弹性较高,企业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那么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大。

本文借鉴 Melitz & Ottaviano(2008)异质性企业加成率模型,引入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假定消费者在连续商品集合上的二次型效用函数为:

$$U = q_0^c + \alpha \int_{i \in \Omega} q_i^c di - \frac{1}{2} \gamma \int_{i \in \Omega} (q_i^c)^2 di - \frac{1}{2} \eta \left( \int_{i \in \Omega} q_i^c di \right)^2 \quad (1)$$

式(1)中, $c$ 代表消费者个体, $q_0^c$ 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量, $q_i^c$ 是消费者对第*i*种商品的消费量, $\Omega$ 是商品的集合, $\alpha$ 和 $\eta$ 表示消费者在各种异质性商品之间的替代程度, $\gamma$ 表示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程度,反映到市场上也可以衡量产品替代性。通过求解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可得商品*i*的市场需求函数为:

$$q_i \equiv Lq_i^c = \frac{\alpha L}{\eta N + \gamma} - \frac{L}{\gamma} P_i + \frac{\eta N}{\eta N + \gamma} \frac{L}{\gamma} \bar{P} \quad (2)$$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利用零利润条件,得到商品价格的上限以及企业的停止生产点  $C_D$  如下:

$$P_{\max} = \frac{1}{\eta N + \gamma} (\gamma \alpha + \eta NP) \equiv C_D \quad (3)$$

该成本值是在市场上能够生产和销售的在位企业的最大成本值,如果企业成本高于这一临界

值,那么短期内企业的边际成本高于单位产品价格,企业就会停止生产。企业成本包括制度成本、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销售成本等,其中,制度成本会影响到每个企业的成本函数,进而影响市场均衡下的临界成本值,产生一般均衡条件下的综合影响。企业进入市场需要支付固定成本为 $f_e$ ,面临的制度性成本为 $cost_a$ ,营商环境改善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显著提升企业的市场进入。企业的总固定成本为 $f_e + cost_a$ ,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p - c)q$ ,结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的产量和定价决策,得到企业绝对意义上的定价能力是 $\mu(c) = p(c) - c$ 。根据企业自由进入市场均衡条件,在给定的分布条件下,企业的市场临界成本值为:

$$C_D = \left[ \frac{2(k+1)(k+2)\gamma(c_m)^k (f_e + cost_a)}{L} \right]^{1/(k+2)} \quad (4)$$

从而效用水平为:

$$U = 1 + \frac{1}{2\eta} (\alpha - C_D) \left( \alpha - \frac{k+1}{k+2} C_D \right) \quad (5)$$

定义企业在 $[0, \bar{c}_m]$ 上服从 $G(c) = (c/\bar{c}_m)^k$ 分布,如果企业成本值满足 $c > C_D$ 就不会生产,如果生产成本为 $\bar{c}_m$ 的企业都能够在市场上获利,则由 $C_D = \bar{c}_m$ 并且所有企业都会在短期内进行生产,通过零利润条件求得市场临界成本值和在位企业数量之间关系为:

$$N = \frac{2\gamma}{\eta} \frac{\alpha - C_D}{C_D - c} = \frac{2(k+1)\gamma}{\eta} \frac{\alpha - C_D}{C_D} \quad (6)$$

在短期均衡条件下,市场规模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定价能力,市场规模的变化只会使得企业调整产出,只有在长期均衡时,有大量企业进入的情形下,才会有企业间的再分配,并引起市场临界成本值变化。

根据企业定价能力 $\mu(c)$ 和市场临界成本值 $C_D$ 表达式,分析均衡时营商环境改善引起的制度成本变化对企业定价能力的一阶影响效应,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mu(c)}{\partial C_D} = \frac{(k+1)\gamma(c_m)^k}{L} (f_e + cost_a)^{-(1-k)/(k+2)} > 0 \quad (7)$$

因此,企业定价能力是制度成本的增函数,这表明在给定企业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形下,营商环境改善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市场临界成本),促进更多企业进入市场竞争,从而引起加成率和定价能力下降。

企业的其他固定成本(例如行业进入成本),还有产品间替代弹性也会影响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作用,如果企业所在行业进入成本较高,原有在位企业会容易利用先行市场势力优势,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定价能力抑制性就有所减弱,如果企业产品替代弹性较高,在位企业没有较强市场势力,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定价能力抑制性就比较明显。

根据式(7)继续对企业进入市场的固定成本和产品替代弹性参数求解二阶偏导,可以得到:

$$\frac{\partial^2 \mu(c)}{\partial C_D \partial f_e} = \frac{-(k+1)^2 \gamma(c_m)^k}{L(k+2)} (f_e + cost_a)^{-(3-2k)/(k+2)} < 0 \quad (8)$$

$$\frac{\partial^2 \mu(c)}{\partial C_D \partial \gamma} = \frac{(k+1)(c_m)^k}{L} (f_e + cost_a)^{-(1-k)/(k+2)} > 0 \quad (9)$$

因此,面临行业进入的固定成本较低,产品替代弹性较高的企业,以及在企业面临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制度性壁垒较弱时,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性会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探讨的理

论逻辑在于,营商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的制度进入壁垒,进而降低制度性成本和市场的临界成本值水平,引致更多企业进入市场,造成市场竞争加剧,抑制企业加成率和定价能力上升。同时,随着企业数量和竞争程度增加,如果企业所在行业的进入成本较高,在位企业的先行优势和垄断势力较强,那么整体上企业定价能力下降幅度就越小,如果企业的产品间替代弹性越高,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越大,那么企业定价能力下降就比较突出。

### 三、研究设计

#### (一)变量说明

##### 1. 企业定价能力

根据前面定义,本文的企业定价能力采用企业加成率衡量,借鉴 De Loecker & Warzynski(2012)方法测算,依据方程如下:

$$L(X_{it}^1, \dots, X_{it}^v, K_{it}, \lambda_{it}) = \sum_{v=1}^V P_{it}^{X^v} X_{it}^v + r_{it} K_{it} + \lambda_{it} (Q_{it} - \bar{Q}) \quad (10)$$

式(10)中, $L$ 为各种成本集合, $V$ 是可变投入,包括劳动力、中间投入等, $K$ 是资本, $Q$ 为企业生产函数, $P_{it}^{X^v}$ 是可变投入对应价格, $r_{it}$ 是资本投入价格。通过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可以推导得到企业加成率为:

$$\mu_{it} = \frac{\theta_{it}^X}{\alpha_{it}^X} \quad (11)$$

其中, $\theta_{it}^X$ 为可变投入的产出弹性, $\alpha_{it}^X$ 为可变投入的收入份额。中间投入品的产出弹性需要对生产函数进行估算得到。

本文的基本设定是采用中间品投入作为计算企业定价能力的可变投入,但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定价能力在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中出现分化趋势,为了保证回归估计结果不受企业定价能力测算方式的影响,借鉴陈登科(2020)做法,使用企业新产品产值作为有偏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并将其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互加入估算生产率的方程中,进而得到基于中间品投入的定价能力 $\mu_{it}$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出来的中间品投入份额的加总值要低于整个行业的中间品投入份额,该差异可能会导致对企业定价能力的估计向上偏误,但是只要这种偏差不发生系统性变化,在面板模型估计中的固定效应就可以将其吸收。

##### 2. 营商环境

郭敬生(2019)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比较宽泛概念,应该包括地区的契约效率、法律、行政、融资等多种环境因素。张菡洺和杨广钊(2022)认为营商环境是由政府主导并对企业生存、发展、效率提升产生影响的各种环境因素的综合。依据夏后学等(2019)研究,营商环境应该包括政府、市场、融资、企业等方面因素。范合君等(2022)认为营商环境是企业从事创业、创新、融资、投资活动所面临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生态系统。基于这些认识,综合考虑数据采集方面原因,本文从政务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五个角度出发共17个指标对各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水平进行度量。考虑到既有研究中没有将地区的互联网政务、创新创业扶持政策、资源配置效率纳入衡量标准,因此,本文增加了这几个指标的测度。具体来说,选取各地政务网站上的政府与市场主体的信息交流互动情况、扶持企业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数量、地区的资源错配状况等指标进行分析。构建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所示,为了减少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失,本文数据采用平均值或者平均增长速度,17个二级指标的KMO值大于0.75,各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存在可以提取的公共因子,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个分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从而得到各个地区的营商环境改善程度。

表1 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文献依据和数据来源
政务环境	政商关系	企业政商关系评价	马光荣等(2015),《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2021》
	企业高管对行政事务的参与度	企业高管是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行政事项	夏后学等(2019),何晓斌等(2013),党报数据库
	寻租	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时,是否存在障碍	夏后学等(2019),何晓斌等(2013)
	互联网政务	由各地政府网站的留言办结率、征集调查公布率、差评整改率加权计算	范合君等(2022),各地政务服务网站
	政府换届造成的招商引资和政企合作中断	政府换届前公布但换届后终止的招商引资项目占比	各地政府网站
经济环境	金融支持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 <i>GDP</i>	中国人民银行
	创新创业支持	扶持企业创新创业的贷款、补贴、奖励和税收的优惠政策数量	各地政府网站
	民营企业比重	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城市统计年鉴
社会环境	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错配系数	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季书涵等(2016)
	公共服务	交通、就业、教育、环保等8个领域满意度得分的加权值	城市公共服务蓝皮书
	中介机构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人口	百度地图
法治环境	法规建设	财政透明度	《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司法保障	权责清单和负面清单建设	司法部的《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
	信用监管	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上登记的各地区企业数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国际环境	贸易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 <i>GDP</i>	EPS数据库
	外资企业数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总企业数	EPS数据库
	对外投资	对外非金融投资额/ <i>GDP</i>	EPS数据库

### 3. 主要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和城市两个层面。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对数表示,用样本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企业年龄,采用样本期与企业成立时间之差的表示。企业利润,采用企业的营业利润与销售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工资支出,采用企业应付工资、薪酬和各类保险之和跟从业人员规模的比值表示。企业 *TFP*,采用 *OP* 生产函数测算。企业中间投入比,采用中间投入占工业产值的比值表示。企业资本密集度,采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与雇佣人数的比值表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有: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人均 *GDP* 的对数值表示。人口,采用各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对数表示。三产比值,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财政收入,采用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表示。最低工资,采用各个地区的最低工资表示,由各个城市的政府网站查询获得。是否省会,采用虚拟变量表示,考察城市的行政级别。

####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基准估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mu_{ijt} = \beta_0 + \beta_1 en_{jt} + \beta_2 X_{ijt} + \gamma_i + \lambda_t + \eta_g \lambda_t + \epsilon_{ijt} \quad (12)$$

式(12)中, $\mu_{ijt}$ 表示  $t$  年城市  $j$  企业  $i$  的定价能力,取对数, $en_{jt}$ 表示  $t$  年城市  $j$  的营商环境指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在企业维度和城市维度,故可以弱化互为因果部分的可能。 $X_{ijt}$ 为控制变量, $\gamma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lambda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eta_g \lambda_t$ 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可以控制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趋势, $\epsilon_{ijt}$ 为随机误差项。

#### (三) 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包括:(1)企业层面数据来自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城市层面数据来

自1998—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3)在测算营商环境时,用到克报数据库、EPS数据库、各类研究报告、网上平台、政务网站、人民银行等数据。(4)在内生性分析中,明清商帮数据来自《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国会馆志》《中国会馆史论》,方言数据来自《汉语方言大词典》和《中国语言地图集》。(5)在稳健性分析中,用到2014—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2014—2021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数据(李志军,2021)。

在对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和匹配方面,参考聂辉华等(2012)经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定价能力	$\mu$	63061	1.4568	1.3530	3.1217	0.1220
营商环境	<i>en</i>	61254	27.2259	2.4560	82.4181	5.3513
企业规模	<i>size</i>	65121	11.1345	0.7904	25.1090	4.1121
企业年龄	<i>age</i>	62472	2.1150	0.3378	6.4361	0.0000
企业利润	<i>pro</i>	65133	18.1718	6.2139	33.2134	4.5908
TFP	<i>tfp</i>	64530	5.1680	1.0115	12.2137	0.5131
企业工资支出	<i>wage</i>	60202	4.8136	2.2451	17.2081	0.0326
中间投入比	<i>inm</i>	64238	0.3167	0.0672	0.7632	0.0266
资本密集度	<i>cain</i>	64219	2.1109	0.7821	6.2287	0.1821
城市经济发展	<i>gdp</i>	62335	11.4436	3.1320	23.8130	6.3536
人口	<i>pop</i>	62335	12.1146	5.4480	37.1131	2.2238
三产比值	<i>ind</i>	62335	0.3434	0.8512	0.7103	0.2526
财政收入	<i>gov</i>	62335	0.2891	0.0189	0.5282	0.0251
最低工资	<i>min</i>	59872	6.3109	2.0045	16.0783	2.0110
是否省会	<i>cap</i>	60711	0.0038	0.0141	1.0000	0.0000

####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基本估计

表3为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影响估计结果,列(1)没有增加控制变量,列(2)增加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列(3)增加了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列(4)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由于考虑到不同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趋势,在列(5)中控制了行业—时间效应,从各列回归结果来看,在不同模型设定情况下,营商环境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营商环境与企业定价能力之间为负向关系,也即营商环境可能抑制了企业定价能力。从控制变量回归系数来看,基本符合预期。总体来讲,当控制住一系列复杂因素后,营商环境估计系数并没有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出现大幅变化,这说明基准估计中遗漏偏误可能较小。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en</i>	-0.0072*** (0.0021)	-0.0071*** (0.0021)	-0.0070*** (0.0022)	-0.0070*** (0.0020)	-0.0071*** (0.0020)
<i>size</i>		0.9590*** (0.0333)	0.9522*** (0.0335)	0.8795*** (0.0338)	0.9430*** (0.0341)
<i>age</i>		0.0003*** (0.0001)	0.0003*** (0.0001)	0.0004*** (0.0001)	0.0005*** (0.0000)
<i>pro</i>		0.0315*** (0.0055)	0.0346*** (0.0060)	0.0370*** (0.0050)	0.0355*** (0.0049)
<i>tfp</i>		0.0162*** (0.0014)	0.0168*** (0.0015)	0.0149*** (0.0015)	0.0144*** (0.0011)

续表 3

变量	(1)	(2)	(3)	(4)	(5)
<i>wage</i>		-0.1200*** (0.0068)	-0.1323*** (0.0073)	-0.1446*** (0.0071)	-0.1340*** (0.0070)
<i>imm</i>		-1.1642*** (0.0384)	-1.1355*** (0.0382)	-1.2615*** (0.0375)	-1.1908*** (0.0393)
<i>cain</i>		0.4467*** (0.0165)	0.4616*** (0.0240)	0.4702*** (0.0231)	0.4595*** (0.0159)
<i>gdp</i>			0.0018*** (0.0005)	0.0014*** (0.0005)	0.0015*** (0.0003)
<i>pop</i>			-0.0179*** (0.0028)	-0.0285*** (0.0031)	-0.0211*** (0.0030)
<i>min</i>			-0.0025*** (0.0007)	-0.0017*** (0.0004)	-0.0021*** (0.0007)
<i>ind</i>			0.0008 (0.0007)	0.0004 (0.0004)	0.0007 (0.0005)
<i>gov</i>			0.0337*** (0.0024)	0.0345*** (0.0038)	0.0351*** (0.0041)
<i>cap</i>			0.0017 (0.0012)	0.0016 (0.0011)	0.0018 (0.0012)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一年份 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61254	60481	59587	59468	58890
R <sup>2</sup>	0.6861	0.5488	0.6120	0.7013	0.778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 (二)内生性问题

基本回归估计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随着营商环境改善,如果企业逐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或是改进组织管理效率,都可能会引起 $\beta_1$ 系数向上偏误,反之,如果企业的调整成本或摩擦成本较高, $\beta_1$ 系数则可能会向下偏误。另外,如果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还存在不可观测的城市禀赋因素干扰, $\beta_1$ 系数则可能也是有误的。因此,我们需要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选取应该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两个条件,本文采用明清商帮 $\times cpi$ 作为工具变量 $iv1$ ,这里 $cpi$ 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时间趋势变量,明清商帮衡量的是历史上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它不随时间变化,具有很好外生性。为了在面板模型中使用该工具变量,并使其具有时间上趋势,采用与样本期内各年的城市 $cpi$ 进行交互。从相关性来看,商帮文化越浓厚,意味着该地区的经商氛围越优,而经商氛围属于地区的商业传统,这种传统会不断被继承,所以地区早期的商帮文化对未来的商业发展环境会产生重要影响,故地区的商帮文化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从外生性方面来看,尽管商帮文化距离现在较远,但地区的信息需求比较稳定,可能会导致工具变量具有路径依赖性而非完全外生。总体而言,尽管工具变量商帮 $\times cpi$ 不够完美,但历史条件赋予了它接近外生优势,故使用该工具变量估计能够识别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的影响方向。

工具变量估计中,各地区的明清商帮数据借鉴刘蓝予等(2021)、吴琦等(2019)做法,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国会馆志》《中国会馆史论》,各个地区的 $cpi$ 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并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思路,沿海城市的商业发展要明显优于内陆城市,这背后隐含着丰富含义,也即一个城市到海岸线距离越近,可能具有更好营商环境,故本文借鉴邵敏和武鹏(2019)做法,采用各个城市到海岸线距离 $\times year$ 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 $iv2$ ,道路距离数据的处理采用Arc-GIS软件基于经纬度进行筛选。方言作为地区文化的象征,方言

多样性可能代表影响地区商业发展的资本流动、贸易流动和人口流动情况,并且方言自唐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不受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以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会通过商业发展来实现,故选取方言×汇率作为第四个工具变量  $iv3$ ,各地区的方言数据来自《汉语方言大词典》和《中国语言地图集》,按照徐现祥等(2015)方法测算各个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

根据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KPF值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临界值,即不存在工具变量不可识别问题,第一阶段 F 值均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回归结果可知,营商环境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此外,本文还使用系统 GMM 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发现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有抑制影响,但仍需要考虑一些因素影响,例如,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外在条件变化、初始发展趋势差异的影响,是否受营商环境和定价能力的测度定义影响,以及同时期其他政策因素是否会产生干扰。下面进行逐个分析。

#### 1. 控制前期趋势项检验

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加快完善营商环境软实力,例如,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外商投资法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改革,不断为民营企业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本文使用这一外生冲击,识别营商环境的外生条件发生变动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这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DID)对数据进行检验,表4列(1)为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其中核心解释变量是2001年的营商环境同其他年份时间虚拟变量的乘积,由结果可知,实验组前4年的虚拟变量对定价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外生变化发生之前,营商环境没有发生较大冲击,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营商环境引起定价能力的变动趋势并无系统性差异,但在2002年以后,实验组的影响效果比较显著,这也印证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产生影响的有效性。另外,我们采用2001年外商投资占固定投资比值来衡量地区的营商环境程度,将核心解释变量定义为2001年的外商投资与2002年年份虚拟变量的乘积,列(2)为对应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设定完全不同的识别策略,结果依然稳健。

由于企业之间定价能力不同,并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出现趋势性差异,导致回归估计有误。本文将1997年企业定价能力增速与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交互,放入基准方程作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为表4列(3)。为了控制企业定价能力有可能向均值回归,列(4)加入企业定价能力的滞后项。进一步地,本文发现营商环境指数变化率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通过进行城市层面人口、GDP、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等变量对营商环境的回归发现,GDP能够解释地区营商环境指数增长的90%以上,为了避免地区初始发展差异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趋势导致的混杂估计结果,我们在回归中添加了1997年地区经济发展的变量,并与年份虚拟变量、年份平方项进行交互,从而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初始差异的线性趋势和非线性趋势,回归结果见表4列(5),结果表明,无论添加哪种趋势项检验,营商环境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4 控制前期趋势项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i>DID</i>	<i>fdi</i>	初始趋势	均值回归	经济发展趋势项	下一期
<i>en</i>			-0.0051*** (0.0014)	-0.0033*** (0.0005)	-0.0046*** (0.0005)	
<i>en</i> × <i>year02</i>	-0.0134*** (0.0026)					
<i>fdi</i> × <i>post02</i>		-0.0219*** (0.0035)				
<i>en</i> ×年份	控制					

续表 4

变量	(1)	(2)	(3)	(4)	(5)	(6)
	<i>DID</i>	<i>fdi</i>	初始趋势	均值回归	经济发展趋势项	下一期
<i>fdi</i> ×年份		控制				
$\mu$ 增速×年份			控制			
$\mu$ 滞后项				控制		
经济发展×年份					控制	
经济发展×年份平方					控制	
<i>en</i> +1						0.0021 (0.0014)
观测值	59565	61136	61215	60500	60217	58870
R <sup>2</sup>	0.6147	0.7760	0.8132	0.7560	0.7215	0.7746

注：限于篇幅，表 5 中其他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进行控制的结果没有汇报。

##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政策冲击不随机和地区异质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随机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构建虚假分组的虚拟变量，并进行重复 1000 次的安慰剂检验，由虚假估计系数的分布结果可知，如图 1 所示，基于随机样本估计的系数均值在 0 附近，并且 1000 次安慰剂检验得到估计系数小于基准估计系数的概率低于 5%，这表明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并不是常规的随机因素和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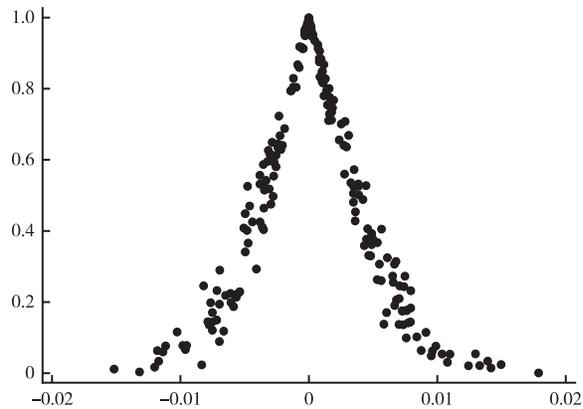


图 1 安慰剂检验

如果未来一期的营商环境影响了当期企业定价能力，说明回归中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它可能会同时对营商环境和定价能力产生影响。故我们采用未来一期的营商环境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 4 列(6)回归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影响估计不显著，这就排除了基准回归中遗漏重要变量的担忧。

## 3. 替换变量测度

为了缓解指数构造方式可能带来偏误，本文使用营商环境其他相关指标，各地区的政务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作为营商环境的替代变量，发现无论哪种设定，营商环境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此外，我们变换了定价能力测度方法，使用会计法，将企业加成率定义为增加值/(中间投入+劳动支出)，借鉴 Lu & Yu(2015)方法，使用材料投入计算加成率，从表 5 各列回归结果来看，各种变量替换方法得到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结论一致。

表5 替换变量的测度

	营商环境					定价能力	
	(1)	(2)	(3)	(4)	(5)	(6)	(7)
	政务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	法治环境	国际环境	会计法	材料投入
替换营商环境	-0.0091*** (0.0030)	-0.0062*** (0.0019)	-0.0056** (0.0023)	-0.0044** (0.0017)	-0.0043** (0.0017)		
替换定价能力						-0.0105*** (0.0037)	-0.0133*** (0.0042)
观测值	58772	59751	62121	60013	58044	61022	59866
R <sup>2</sup>	0.8667	0.8133	0.8566	0.7437	0.8008	0.8623	0.8141

4. 竞争性假说排除

在同一样本区间,可能存在很多政策对结论的稳健性造成干扰。例如,2003年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2001年对开发区政策的实施放宽,2002年加入WTO以后,关税大幅削减和外资大规模进入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长,对劳动力市场供给造成冲击。因此,为了验证本文结论稳健性,表6中将对各种竞争性假说进行逐一排除。表6列(1)为删去国有企业样本估计,列(2)为删去变更企业地址样本估计,列(3)加入关税冲击变量(采用各地区的进口比重衡量)作为控制变量,列(4)加入外商投资变量(采用各地区的外商投资占固定投资的比重衡量)作为控制变量,列(5)加入大学扩招冲击变量(采用各地区在校大学生数量比重衡量)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的进口、外商投资和大学生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在排除以上各种竞争性假说以后,发现基本回归结论依然稳健。另外,为了说明结论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替换数据办法:(1)根据营商环境指数大小对城市进行排名,将营商环境排名四分位数前25%的城市样本剔除,采用其余样本考察,估计结果见列(6)所示;(2)采用李志军(2021)对各个地区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数据,并使用2014—2021年上市公司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回归如列(7)所示,发现结果与基本回归结论一致。

表6 竞争性假说排除

	(1) 国企改革	(2) 开发区	(3) 关税削减	(4) 外商投资	(5) 大学扩招	(6) 剔除前25%样本	(7) 2014—2021年
<i>en</i>	-0.0058*** (0.0010)	-0.0062*** (0.0011)	-0.0051*** (0.0011)	-0.0059*** (0.0013)	-0.0043*** (0.0009)	-0.0033*** (0.0009)	-0.0101*** (0.0018)
关税 削减			-0.0487*** (0.0022)	-0.0446*** (0.0020)	-0.0487*** (0.0020)		
外商 投资				-0.1340*** (0.0116)	-0.1498*** (0.0139)		
大学 扩招					0.0009*** (0.0003)		
观测值	46913	35200	60447	59123	58072	41324	23361
R <sup>2</sup>	0.6899	0.8187	0.8579	0.7714	0.8659	0.9030	0.8045

五、机制检验和进入壁垒分析

(一)作用机制

前面通过丰富的识别策略和各种稳健性分析,结论表明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产生抑制影响,接下来考察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定价能力的作用机制。营商环境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定价能力:制度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也即营商环境改善促进企业制度性成本(市场临界成本)降低,引起更多企业进入市场,加剧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加成率和定价能力下降。

## 1. 制度成本降低效应

本文使用企业的管理费用作为企业进入退出成本的代理变量,表7中列(1)为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进入退出成本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这说明营商环境降低了企业进入退出的门槛,也即营商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切实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促进更多新企业进入市场。由于企业的管理费用中包含了职工的教育和培训费用,故不能完全反映制度成本,为了验证制度成本降低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市场准入成本来衡量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借鉴孙浦阳等(2021)研究,市场准入成本基于时间成本和单位运费进行计算。列(2)为营商环境对企业市场准入成本的回归,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和制度成本。

## 2. 市场竞争效应

接着分析营商环境是否提升了竞争程度增加,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进入时间和退出时间,定义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虚拟变量,采用概率模型估计营商环境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结果如列(3)(4)所示,可以发现营商环境导致企业进入概率是企业退出概率的2倍多。也就是说,营商环境改善整体上产生的企业进入效应要大于退出效应,因此,营商环境改善导致企业之间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既然营商环境导致大量新企业进入,那我们不妨验证新建企业数量是否对企业定价能力产生负向影响?回归中的新建企业数量为各城市每年累计的新创办企业数量,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因变量定价能力为该城市的企业定价能力的中位数值,二者之间估计结果如列(5)所示,可以看出,地区新建企业数量越多,则企业定价能力的中位数越低,这说明营商环境改善确实通过促进大量新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平均定价能力。上面分析的是企业定价能力受市场上企业数量的影响,为了得到更为全面考察效果,我们再考虑企业空间分布对定价能力的影响,大量企业进入可能会引起产业集聚,故对产业集聚影响定价能力的效果作进一步验证。借鉴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做法,采用区位熵方法测算地区的产业集聚指数,列(6)为营商环境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可以看出营商环境改善显著提升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列(7)估计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也会导致企业定价能力下降。

表7 制度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7)
	管理费用	市场准入	企业进入	企业退出	定价能力	产业集聚	定价能力
<i>en</i>	-3.0361*** (0.0350)	-0.7845*** (0.0092)	0.0478*** (0.0044)	0.0216*** (0.0036)	-0.0041*** (0.0015)	0.0007*** (0.0002)	-0.0038** (0.0015)
企业数量					-0.0430*** (0.0027)		
<i>en</i> ×产业集聚							-0.0311*** (0.0047)
观测值	60033	59467	60239	59573	58426	58709	57831
R <sup>2</sup>	0.8467	0.7790	0.8560	0.8327	0.7341	0.8809	0.8126

## 3. 进一步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中,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往往在融资、技术创新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营商环境改善更有利于降低大规模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大规模企业将降低的生产成本反映在产品价格上,那么大规模企业的定价能力是相对提升的。大规模企业的降价行为将迫使中小规模企业跟随降价,由于中小规模企业的生产成本受营商环境改善影响的下降幅度有限,所以中小规模企业定价能力就可能下降。后面的异质性分析中会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区分,实证探讨营商环境对不同规模企业定价能力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大规模企业来说,营商环境改善对其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表现不显著。

营商环境降低了企业定价能力,那么对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产生影响,反映定价能力的指

标值大于1意味着企业的价格和成本不一致,存在市场扭曲,所以如果企业整体上的定价能力下降,那么地区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得到了提升,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度来衡量资源错配,表8列(1)为营商环境对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的回归估计,可以看出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了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尼系数来替换离散度做稳健性检验,列(2)为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尼系数的回归,结论表明列(1)估计结论稳健。列(3)使用企业定价能力的离散度作为地区资源错配的代理变量,结论同样说明营商环境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为了说明资源错配的来源,将所有企业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行业内市场销售额排名前10的企业组成,另一类是由其余企业组成,然后估计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离散度的影响,发现规模大的头部企业定价能力离散度下降不明显,营商环境改善主要影响的是中小规模企业的定价能力离散度。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前面所论述的大规模企业的定价能力受市场竞争效应影响较小的判断。

表8 企业资源配置

变量	(1)	(2)	(3)	(4)	(5)
	离散度	基尼系数	离散度	前10企业	其他企业
<i>en</i>	-0.0505*** (0.0047)	-0.0431*** (0.0027)	-0.0292*** (0.0023)	-0.0018 (0.0012)	-0.0042*** (0.0013)
观测值	62010	61422	58995	3417	57132
R <sup>2</sup>	0.8113	0.8789	0.8031	0.7837	0.7930

## (二)进入壁垒的分析

### 1. 制度壁垒

我们采用王小鲁等(2019)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壁垒的代理变量,考察制度壁垒对营商环境抑制定价能力的调节影响,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产生制度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但这些效应在不同制度壁垒地区会产生差异影响,例如,某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制度壁垒可能就越低,那么营商环境改善对该地区的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就越明显。本文市场化程度采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指数、非国有经济分指数、总指数三个指标,回归中采用3个市场化指标与营商环境进行交互,因变量为定价能力。表9为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也即制度壁垒越低的地区,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越突出。政府与市场关系反映了地区的政商关系是否优良,非国有经济发展反映了地区民营企业成长情况,总指数反映的是地区的整体市场化程度,这几个指标均对营商环境抑制企业定价能力有促进作用。该结果表明,在营商环境抑制企业定价能力的效应中,制度壁垒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化机制,能够促进营商环境对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水平。

表9 制度壁垒

变量	(1)	(2)	(3)	(4)	(5)	(6)
	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	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	非国有经济指数	非国有经济指数	总指数	总指数
<i>en</i>	-0.0042 (0.0028)	-0.0042 (0.0029)	-0.0033 (0.0024)	-0.0033 (0.0023)	0.0090*** (0.0030)	0.0089*** (0.0029)
市场化× <i>en</i>	-0.0152*** (0.0033)	-0.0164*** (0.0038)	-0.0218*** (0.0044)	-0.0219*** (0.0039)	-0.0240*** (0.0032)	-0.0240*** (0.0033)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876	60056	61230	59389	60291	60257
R <sup>2</sup>	0.8135	0.8240	0.8315	0.7944	0.7579	0.7866

## 2. 行业壁垒

企业在市场中不仅面临制度壁垒,还受行业壁垒的制约,本文使用行业进入成本来考察行业壁垒,当进入成本较高时,表明新进入企业的行业壁垒较强,在位企业更能够掌控市场势力,因此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相对减弱。借鉴孙浦阳和宋灿(2023)、李坤望和王永进(2010)的研究,我们采用行业的固定成本、沉没成本、契约密集度来刻画行业进入成本,其中,固定成本为非生产性支出所占比重,即行业的平均管理费用占行业平均增加值的比重表示,沉没成本为行业平均的企业市场份额乘以行业平均资本产出比,契约密集度为行业契约的流程化和制式化程度。具体地,这三个指标值越大,说明行业进入的固定成本、沉没成本、契约密集度越高。表10为使用固定成本、沉没成本、契约密集度衡量的行业进入成本,并与营商环境做交互,然后对定价能力进行回归,由表9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行业进入成本越高,新企业的进入壁垒就越大,在位企业的市场优势更突出,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就有所减弱。

表10 行业壁垒

变量	(1)	(2)	(3)	(4)	(5)	(6)
	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	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	契约密集度	契约密集度
<i>en</i>	-0.0013*** (0.0004)	-0.0012*** (0.0004)	-0.0021*** (0.0007)	-0.0019*** (0.0006)	-0.0010*** (0.0002)	-0.0010*** (0.0003)
行业进入成本× <i>en</i>	0.0700*** (0.0041)	0.0820*** (0.0050)	0.0450*** (0.0061)	0.0410*** (0.0070)	0.0530*** (0.0022)	0.0530*** (0.0031)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9193	59137	60418	60319	62613	61051
R <sup>2</sup>	0.7135	0.7080	0.8231	0.8026	0.7267	0.7048

## 3. 产品壁垒

另外,本文使用产品替代弹性来衡量企业的产品壁垒,如果产品替代弹性越低,新进入企业的产品与在位企业的产品差别越大,那么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会相对明显,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就越小,也即较高的产品壁垒会阻碍营商环境改善产生的市场竞争效应发挥作用。本文使用企业的广告费用、资产专用性、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衡量企业的产品替代弹性,广告费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资产专用性采用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产品差异化采用孙浦阳等(2021)做法,可以预计企业的广告费用越高,资产专用性越强,产品差异化越大,则企业的产品替代弹性就会越低,那么就可能削弱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营商环境与广告费用、资产专用性、产品差异化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说明产品替代弹性越低,产品壁垒越高,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就越弱。

表11 产品壁垒

变量	(1)	(2)	(3)	(4)	(5)	(6)
	广告费用	广告费用	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	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
<i>en</i>	-0.0048*** (0.0012)	-0.0049*** (0.0011)	-0.0018** (0.0008)	-0.0018** (0.0007)	-0.0045** (0.0022)	-0.0045** (0.0021)
产品替代弹性× <i>en</i>	0.1553*** (0.0024)	0.1413*** (0.0021)	0.1019*** (0.0021)	0.1019*** (0.0020)	0.0859*** (0.0033)	0.0850*** (0.0033)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116	58110	58903	58715	59842	59713
R <sup>2</sup>	0.8079	0.8112	0.8049	0.8090	0.7860	0.7541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营商环境对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受进入壁垒的影响,如果企业面临的制度壁垒、行业壁垒、产品壁垒较弱,那么营商环境就能够起到降低企业定价能力、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作用,这说明营商环境改善效果与市场机制密不可分,高效和开放的市场化改革更有助于发挥营商环境改善的作用。

## 六、异质性分析

上述分析从总体上研究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但没有区分企业异质性,要全面了解营商环境的这种影响,还需要深入探究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差异,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研究和政策建议,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 (一)企业创新和融资的异质性

企业的定价能力与其创新正相关,本文从两个角度衡量企业的创新程度:(1)是否有新产品产值,(2)企业的人均研发投入。表12列(1)样本为有新产品产值的企业,列(2)样本为无新产品产值的企业,可以看出,营商环境对有新产品产值企业的定价能力不产生明显影响,对无新产品产值企业的定价能力影响显著为负。列(3)为人均研发与营商环境交互项对定价能力的回归估计,可以看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也即企业创新水平越高,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越低,说明企业创新可以缓解营商环境对其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接着对其背后原因进行分析,我们采用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占行业市场销售额比值的倒数来衡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该指标值越大,说明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突出。列(4)为企业创新对其市场竞争压力的回归影响,可以看出,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越有助于降低其市场竞争压力,由此说明企业创新通过缓解市场竞争压力,从而对营商环境抑制其定价能力起到调节作用。既然创新对企业如此重要,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又需要大量的资金购买材料设备、支付科研人员薪酬,因此,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将限制其进行创新,从而影响企业定价能力。本文定义企业融资约束=应付利息/销售利润,列(5)表明融资约束确实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效应,从列(6)融资约束与营商环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来看,融资约束较强,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就会越大。

表12 创新和融资的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6)
	有新产品	无新产品	定价能力	市场竞争压力	创新	定价能力
<i>en</i>	0.0021 (0.0015)	-0.0044*** (0.0011)	-0.0080** (0.0033)			-0.0020*** (0.0007)
<i>en</i> ×创新			0.0221*** (0.0055)			
创新				-0.0418*** (0.0035)		
融资约束					-0.0010** (0.0005)	
<i>en</i> ×融资约束						-0.0266*** (0.0039)
观测值	30465	21359	60113	60185	58509	57886
R <sup>2</sup>	0.8156	0.7345	0.7811	0.7980	0.7119	0.8005

### (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前文探讨了企业规模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大规模企业具有较强的融资和技术创新能力,并且凭借市场垄断地位的优势,也有能力将负面损失转嫁给消费者。本文按照4位行业代码,依据企业的销售额大小来衡量企业规模,将销售额前10名的企业列为大规模企业,将销售额在10名以后的企业列为小规模企业,然后分别估计营商环境对两类规模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效果。可以推测,大规模企业的市场垄断优势比较明显,营商环境对其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较小。表13列(1)(2)的估计

结果显示,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但大规模企业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小规模企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受到的冲击较小,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大规模企业的行业垄断地位优势缓解了营商环境对其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这从侧面也反映了营商环境主要抑制的是小规模企业的定价能力。表13列(3)(4)为营商环境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的估计,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提升了小规模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由此印证了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在营商环境改善过程中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小。

表13 企业规模异质性

变量	定价能力		市场竞争压力	
	(1)	(2)	(3)	(4)
	规模大	规模小	规模大	规模小
<i>en</i>	-0.0025 (0.0017)	-0.0103*** (0.0022)	0.0066 (0.0048)	0.0419*** (0.0049)
观测值	3417	57132	3417	57132
R <sup>2</sup>	0.8160	0.8144	0.7258	0.8398

### (三)企业技术的异质性

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的技术水平,将其与营商环境做交互项,然后对定价能力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4列(1)所示,可以看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与低技术企业相比,高技术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营商环境改善对高技术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较弱,所以营商环境改善主要抑制的是低技术企业的定价能力。

### (四)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

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例如,民营企业在某些行业领域会更难获得外部融资,国有企业在地方承担着税收和就业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对生产投入要素的采购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此外,国有企业在审批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营商环境改善前后面临的制度性成本较低,因此,国有企业受营商环境改善对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更小一些。本文依据是否国有企业定义虚拟变量,然后构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并对定价能力进行回归,由表14列(2)结果表明,营商环境对国有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不显著。

### (五)出口的异质性

相比专注于国内市场的企业来说,出口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较为激烈,受到营商环境改善的冲击影响可能更为突出,这里定义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为1,然后构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并对定价能力进行回归,可以预计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受营商环境改善的抑制影响更大。表14列(3)为对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也就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 (六)地区的异质性

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差距较大,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企业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营商环境改善会加剧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因此,预期在东部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对定价能力的抑制影响会更强。本文定义东部地区企业的虚拟变量为1,并构建该地区企业的虚拟变量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对定价能力进行回归,从表14列(4)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与中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企业受营商环境改善的冲击更为突出,也即营商环境对东部地区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 (七)存续的异质性

本文定义,如果企业在下一期退出市场,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然后构建非存续企业的虚拟变量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对定价能力进行回归估计,由于非存续企业退出市场的原因可能与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有关,故营商环境对非存续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较大。从表14列(5)结果可以看出,营商环境对非存续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这表明将要退出市场的

企业受营商环境改善产生的竞争影响较大,市场竞争效应越明显,这类企业的定价能力下降就越多。

(八)企业内、外资的异质性

一般来说,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方面更具有优势,并且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优势地位较为明显,也更有能力将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负面损失进行转移,故可以推测外资企业定价能力受到的抑制效应较小。本文依据是否外资企业构建虚拟变量,并与营商环境做交互项,之后对定价能力做回归估计,表14列(6)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与外资企业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外资企业受营商环境改善引起的国内市场竞争效应的影响较小,所以营商环境主要影响的是内资企业的定价能力。

表14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技术	所有制	出口	地区	是否存续	内外资
<i>en</i> ×技术	0.0046*** (0.0010)					
<i>en</i> ×国有企业		0.0039 (0.0027)				
<i>en</i> ×出口企业			-0.0024*** (0.0008)			
<i>en</i> ×东部地区				-0.0027*** (0.0006)		
<i>en</i> ×非存续企业					-0.0052*** (0.0010)	
<i>en</i> ×外资企业						0.0008 (0.0006)
观测值	59889	58383	40817	61790	28195	41370
R <sup>2</sup>	0.8045	0.7112	0.7240	0.8852	0.7878	0.8271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营商环境改善有助于重塑政商关系,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切实为企业减负,这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较多文献关注了营商环境对生产率、创新、融资、经营绩效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营商环境改善可能给企业定价能力带来怎样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企业定价能力之间为负向关系。原因在于,营商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和市场临界成本水平,促进大量企业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加成率和定价能力下降。对于市场化程度高、进入成本低、产品替代弹性强的企业来说,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定价能力离散度,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此外,对于创新水平高、规模大的企业来说,营商环境改善对定价能力的抑制作用较小,主要是由于这类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小。而对于融资约束紧、技术水平低、民营企业、出口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非存续企业、内资企业来说,营商环境对企业定价能力的抑制效应会比较明显。

本文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能够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加剧了市场竞争,降低企业的加成率和定价能力,提升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该研究涉及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具有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应该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将制度性层面的改革与互联网业务相结合,不断推出审批流程和方式的数字化创新,切实加强为微观企业提供细致周到服务,做好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断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和市场准入待遇,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水平,彻底打破地区间市场分割和行业竞争的制度壁垒,才能真正实现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第二,由于部分企业面临自身创新水平低、融资约束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所有制歧视等问题,所以营商环境改善带来市场竞争效应可能会加深对这类企业定价能力的负面影响,其实这并不是企业决策出现问题,而是这些因素中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和退出市场风险,从而可能会阻碍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完善营商环境相关规章制度的同时,还要不断推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降低各种市场进入壁垒,为企业创办一个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这些政策对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为企业减负不能仅仅依靠对营商环境进行单方面的改革,还需要多领域改革的协调与配合,只有实现全方位改革,营商环境改善成效才能事半功倍。因此,政策制定部门应该同步推行多领域的改革创新,逐步降低行政体制和机制上的成本,提升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不断创造尊商亲商重商的良好氛围。当然,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让营商环境的改善效果落到实处,提升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效率,还需要进行不断探索和努力。

第四,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在市场垄断地位方面更有优势,其定价能力在营商环境改善的影响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同时,部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由于受限于自身发展因素影响,在创新投入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导致其受到营商环境改善的冲击要比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更深。如果上述因素持续发展,可能会使得企业之间的定价能力出现极化,即少数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会更好。这最终会拉大宏观产业定价势力差距,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一趋势会损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高速增长。而企业创新能够显著缓解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制定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帮扶中小企业在市场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实现良性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创新和技术应用能力,是现阶段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 参考文献:

- 柏培文 喻理,2021:《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格加成: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 陈登科,2020:《贸易壁垒下降与环境污染改善——来自中国企业污染数据的新证据》,《经济研究》第12期。
- 陈永伟 胡伟民,2011:《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季刊)》第10期。
- 董志强 魏下海 汤灿晴,2012:《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
- 杜运周 刘秋辰 陈凯薇 肖仁桥 李姗姗,2022:《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管理世界》第9期。
- 范合君 吴婷 何思锦,2022:《“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基于互动治理的视角》,《管理世界》第10期。
- 郭敬生,2019:《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价值、遵循、机遇和路径》,《经济问题》第3期。
- 何晓斌 蒋君洁 杨治 蔡国良,2013:《新创企业家应做“外交家”吗?——新创企业家的社交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管理世界》第6期。
- 侯冰清 王兵,2022:《营商环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球层面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
- 黄先海 王煌 陈航宇,2019:《人口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 黄先海 诸竹君 宋学印,2016:《中国中间品进口企业“低加成率之谜”》,《管理世界》第7期。
- 季书涵 朱英明 张鑫,2016:《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 李坤望 王永进,2010:《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季刊)》第3期。
- 李志军,2021:《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国发展出版社。
- 刘锦 王学军,2014:《寻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30省12367家企业的证据》,《科学学研究》第10期。
- 刘蓝予 周黎安 吴琦,2021:《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经济影响——基于明清商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
- 马光荣 樊纲 杨恩艳,2015:《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差异、变迁与影响》,《管理世界》第12期。
- 聂辉华 江艇 杨汝岱,201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第5期。
- 牛志伟 许晨曦 武瑛,2023:《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管理世界》第2期。
- 钱学锋 范冬梅,2015:《国际贸易与企业价格加成: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研究》第2期。
- 邵朝对 苏丹妮,2019:《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GVC升级的本地化路径》,《管理世界》第8期。
- 邵敏 武鹏,2019:《出口贸易、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兼议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升级》,《管理世界》第3期。
- 申烁 李雪松 党琳,2021:《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与管理研究》第6期。
- 盛丹 刘竹青,2017:《汇率变动、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的成本价格加成》,《世界经济》第1期。
- 盛丹 张慧玲 王永进,2021:《税收激励与企业的市场定价能力》,《世界经济》第7期。

- 孙浦阳 宋灿,2023:《贸易网络、市场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提升》,《世界经济》第3期。
- 孙浦阳 张陈宇 杨易擎,2021:《生产分割、信息摩擦与关税传导:消费市场的理论与经验》,《世界经济》第2期。
- 王小鲁 樊纲 胡李鹏,2019:《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琦 周黎安 刘蓝予,2019:《地方宗族与明清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
- 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2019:《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4期。
- 许明 李逸飞,2018:《中国出口低加成率之谜:竞争效应还是选择效应》,《世界经济》第8期。
- 徐现祥 刘毓芸 肖泽凯,2015:《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第2期。
- 杨开峰 王璐璐 仇纳青,2023:《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于文超 梁平汉,2019:《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 张菀滔 杨广钊,2022:《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财贸经济》第10期。
- 赵瑞丽 孙楚仁 陈勇兵,2018:《最低工资与企业价格加成》,《世界经济》第2期。
- 赵瑞丽 尹翔硕 孙楚仁,2019:《大城市的低加成率之谜: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世界经济》第4期。
- 周泽将 高雅萍 张世国,2020:《营商环境影响企业信贷成本吗》,《财贸经济》第12期。
- Autor, D. et al.(2020),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2):645—709.
- Ayyagari, M. et al.(2008), “How important are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role of finance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2:483—516.
- Bah, E.H. & L.Fang (2015),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in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4:159—171.
- Chen, S. et al.(2020), “Broadband internet, firm performance, and worker welfare: Evidence and mechanism”, *Economic Inquiry*, 58(3):1146—1166.
- Commander, S. & J. Svejnar(2011), “Business environment, exports,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1): 309—337.
- Demircuc-Kunt, A. et al.(2006),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incorpo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0(11):2967—2993.
- Do Loecker, J. & F.Warzynski(2012), “Markups and firm-level export stat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6): 2437—2471.
- Edmond, C. et al.(2015), “Competition, markups, and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10):3183—3221.
- Gillanders, R. & K.Whelan(2014), “Open for business? Institution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yklos*, 67(4):535—558.
- Haidar, J.I. (2012), “The impact of business regulatory reforms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6(3):285—307.
- Ključnikov, A. et al. (2016), “The entrepreneurial perception of SME business environment qual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Journal of Competitiveness*, 8:66—78.
- Konings, J. & H.Vandenbussche(2005), “Antidumping protection and markups of domestic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5(1):151—165.
- Lu, Y. & L. Yu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 dispers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7(4):221—253.
- Melitz, M.J. & G.Ottaviano(2008),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5(1): 295—316.
- Piwonski, K. (2010), “Does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a country influence i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Senior Capstone Project for Katherine Piwonski.
- Zhao, L. (2011), “Markups and agglomeration: Price competition verse externalities”, Katholieke University Leuven Discussion Paper.

## Business Environment, Entry Barrier and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YAO Bo<sup>a</sup>, LIU Jie<sup>b</sup>, WEI Wei<sup>c</sup> and WEI Yiming<sup>c</sup>

(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b: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c: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Summary:** Numer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macroeconomic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corporate pricing power.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markup rate and pricing ability of enterprises. Firs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markup rate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theoretically expand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and considering the analysis under market entry barrier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costs, industry fixed costs, and product substitution elasticity. Secondly, this paper use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 from 1998 to 2013 to test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Thirdly,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st reduction effect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as well as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market entry barriers.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resses the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reduces institutional cost and market critical cost, promotes the entry of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tensifie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markup rate and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ost reduction effect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ar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nel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is influenced by entry barriers. If the entry barriers faced by enterprises are weak, the improved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and promot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addition, for enterprises with high innovation level and large scal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a relatively small inhibitory effect on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mainly due to the relatively small market competition pressure faced by such enterprises. For enterprises with tight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low technological level, private enterprises, export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non-surviving enterprises, and domestic enterprise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ir pricing ability will be more significant.

The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1)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arry out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provide meticulous and thoughtful services for enterprises. (2)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ational flow of resource elements, reduce various market entry barriers, and create more a fair market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 (3)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e should promot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multiple fields, gradually reduce the cost of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improve regional market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create a favorable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business. (4)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more policies to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such as helping medium and small-siz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chieve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market-oriented system reform,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i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le innovations in this paper: (1)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cing ability, whi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and its mechanism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filling the research gap in this field. (2) By constructing a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markup rate model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institutional cost and different market entry barriers into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enterprise pricing ability from a general equilibrium perspective. (3) This paper rigorously verifies the institutional cost reduction effect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while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ket entry barriers and multiple heterogeneity tests, which enha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existing literature. (4)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ic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leg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enrich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a significant supplement to existing literature.

**Key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Entry Barrier; Pricing Ability; Market Competi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23, M21, P28

(责任编辑:木丰)

(校对:金禾)